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概论

[法] 萨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法〕萨伊著

陈福生 陈振骅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概论/(法)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2010重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1808-1

I. 政… II. ①萨…②陈…③陈… III. 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922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法]萨伊 著

陈福生 陈振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1808-1

1963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张19 $\frac{1}{2}$

定价:42.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萨伊(1767—1832年)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适当的人。因为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及其大部分实际活动都同“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有着密切联系。

萨伊出生于里昂一个大商人的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不久去英国,他的教育是在英国时期完成的。他在那里既亲自看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发展的情况,也可能读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很吸引着他,尤其是当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他更为兴高采烈,积极拥护。但是当雅各宾党上台以后,他就离开革命而且成为它的反对者了。

在1794年到1799年间,萨伊主编《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并且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803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这部著作,由于反对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曾被禁止重印。直至拿破仑失败法国王朝复辟,才于1814年再版。在萨伊生前,共出过五版(以后三版,分别于1817、1819和1826年印行),几乎每重版一次都有修改。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部中文译本是按法文第四版翻译的英文本转译的。

从1805年起,萨伊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新型纺纱厂。到1813年才恢复研究工作。在拿破仑失败以后不久,他即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并于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这是上述《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缩本。在1828—1830年间,萨伊又把他的讲稿编成了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部巨著所论及的范围虽然很广泛,但是它的基本经济观点则是同《政治经济学概论》一致的。

—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由《绪论》和第一篇《财富的生产》、第二篇《财富的分配》、第三篇《财富的消费》共四部分构成。这种结构就是这本书的副题所以标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原因。

萨伊自己是极重视《绪论》的。他在《绪论》中首先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时应当采用的方法。接着以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从色诺芬起一直到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止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略史。在这里，他特别推崇亚当·斯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自己是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和通俗而又系统化的作家自居的。同时他又指出亚当·斯密著作的一些错误或缺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并说斯密的著作“缺乏条理”。在这部分里，他还批评了李嘉图的抽象法。最后，他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为从国王大臣们一直到普通公民都应熟悉政治经济学。因为当统治者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对他们的各自利益知道得比从前更清楚时，他们就会发见这些利益并没有矛盾”^①。不然，则“……人民铤而走险，……听信恶言，建立更坏的制度”（第52页），那就不好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激进措施，尚心有余悸，也可以看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了。

第一篇虽然标题为《财富的生产》，但从内容上看，萨伊在这一

^① 见本书第49页。以后凡引自本书的语句，均只注明页次，不再指出来源。

篇中所论述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除生产领域的各种问题外,举凡有关商品流通、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以及货币等等问题的讨论,都包含在内。

照萨伊自己的说法,这一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止,着重说明为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从财富的定义以及财富同价值的关系开始,并说明了生产的意义,接着分别讨论他所谓的生产的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然后进一步指出:一切劳动的分类;生产三要素的作用——所谓生产性的服务;分工的利弊;资本的变形以及资本的形成和增加。最后论述所谓无形产品。

第二部分包括从第十四章起以下的九章。照萨伊自己所说,这一部分是“探讨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和偶然原因”(第146页)的。他首先肯定了,只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其次,发表了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谬论。他在这一部分中讨论对生产发生作用的各种外来原因时,着重反对了政府的干预经济活动和拿破仑的经济政策,论证“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第215页)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第212页)这种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平凡而自大的“真理”。最后,以两章的篇幅阐明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也不过“咀嚼科学经济学许久以前已经供给的材料”而已。

第二篇《财富的分配》。萨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说明价值、收入的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怎样进行,并分别阐释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最后提到产品

数量对人口的影响。

第三篇《财富的消费》。萨伊首先说明消费的种类和结果,然后提到个人消费的动机和结果。他在这一篇中所着重探讨的是所谓公共消费。但实际上他所说的是关于国家开支的各种费用、课税和国债等财政问题。

二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家把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捧得很高,认为他是亚当·斯密学说的继承者和在西欧大陆的传播者,并把他当作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们所根据的就是萨伊的这部《政治经济学概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固然是以财富即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但他所着重研究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财富,也没有故意避而不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混同起来,而不知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萨伊在这本书的《绪论》中一开始讲到研究对象时,就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第11页)分离开来。就是说他主张经济同政治分开,使经济活动免受政治的干预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他所以会抱这种主张,诚然是借此来反对拿破仑的尤其是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政治,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抽去社会和阶级的具体内容而抽象地空谈一般经济问题,以便于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从而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奠定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基础。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的著作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因素。萨伊所继承的只是其中庸俗的因素,而对其中的科学成分则或者弃置不谈,或者加以反对。

亚当·斯密的著作虽然是有许多缺点、错误和矛盾的,但它有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研究的对象和总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始终贯彻全书的。可是,萨伊并不懂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书的逻辑结构。他在评论这部杰出的著作时指出:它“……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不齐整的奇妙的创造性理论”(第16页),“许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都缺乏条理。要想透彻了解他,就必须把他的见解加以整理,细细体会”(第40页)。

看来“整理”是必要的了。萨伊是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整理”的。他说政治经济学是“阐明财富确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第42—43页)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彼此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①。萨伊正是抽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剥削关系而空洞地谈论生产的。这样,他就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按照所谓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技术科学了。用这种办法来为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无怪乎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要把萨伊捧上天,认为他是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创建者。他的这种分部法,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稍加变更地(有的略去消费而添上流通,有的则划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部分)沿用很久,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消费和分配是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分配和消费绝不能离开生产而又彼此分离各自独立。所以,萨伊的这种分部法,只不过标志着亚当·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而已,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

可见,萨伊固然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者,但他所继承的不是斯密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因而绝不能把他算作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是继承而且还“发展”了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因而只能把他看作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倡始者之一。

三

萨伊既然抽去了社会经济形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好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谈论生产问题。他认为除任何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用的像阳光、空气等天然存在的物品以外,凡是能够用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品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他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因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第60页)。

他认为由于生产出来的物品具有效用,因此人们就给这种物品以价值。照萨伊的说法,物品价值的唯一基础是它的效用。很明显,他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萨伊所说的效用)混为一谈了。这种观点当然是极错误的,因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价值存在的物质条件,但绝不是价值的基础。如果再考虑到亚当·斯密已经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则萨伊这种见解的错误和庸俗就更清楚了。但这一点对萨伊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萨伊的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且是他用来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工具和引出他自己的生产三要素论的根据。

谁都知道,使用价值绝不是人的劳动所能单独创造的,萨伊既然把它和价值混同起来,就一定会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劳动又是价值的尺度。萨伊认为,斯密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第78页),不能仅归因于劳动。

这样,萨伊从他的效用是价值基础的“理论”引申出生产三要素论。他所理解的这三个生产要素都没有历史的和社会阶级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指一般劳动、生产资料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只要进行生产就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被抹杀了,它的种种矛盾和阶级的剥削关系当然也就都被掩盖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

其实,李嘉图在当时就早已指出:自然力只是同产品的使用价值有关,它对于价值是毫无关系的;生产资料也不能创造新价值;

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唯有人们的劳动。所以，萨伊这种“理论”的错误，很早就已被指出来了。^①但是由于它很适合于辩护的目的，才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总之，依照萨伊的观点，生产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共同协力生产出物品的效用，这种效用就成为该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萨伊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效用论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的。

但是价值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因而成为价值基础的效用也不能不有量和尺度单位问题。我们要问：效用的量的大小如何决定？究竟用什么尺度来测定它的大小？萨伊不但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到需要强度、效用强度等一些废话。不错，他倒是提到过效用的尺度。他说：“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第 60 页）萨伊是坚持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的，那么他如果在逻辑上能够贯彻这种主张，本来应当告诉我们：由效用来测定价值并作为价值尺度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他以及他以后的所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无论怎样探索都不能找到可以测定效用大小的客观标准尺度，因为这种尺度单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他只能因果颠倒地说什么：倒是价值成为效用的尺度了。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仍然要问：价值本身的大小究竟如何决定呢？他说：“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第 60

^① 例如李嘉图对萨伊的这种“理论”所指出的错误。参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43 页。

页)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定量某种商品所付出的货币。这一点萨伊也是同意的。既然如此,价格理应由货币和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价格虽然可以表现出商品价值的大小,但必须以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为基础。萨伊在这里把价值的大小如何决定的问题同价值大小如何表现的问题混同起来,并以后者去替换前者了。

即使如此,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我们还是要问:那么一种商品的价格又由什么并如何决定呢?他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成比例地上升;反过来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第356页)

这样,萨伊当他的效用论不能说明问题时,就不能不借助于庸俗的供求论了。我们都知道,供求关系的变化只会引起价格背离价值而上升或下落,这种关系绝不是决定价格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庸俗的“理论”曾不止一次地予以严厉的批评。他曾这样写道:“如果需要与供给互相均衡,它们就不再能说明任何事物,就不会影响市场价值,让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恰好表示为这个货币额,而不表示为别的数额。”^①

萨伊在这本《政治经济学》中不仅在许多地方谈到供求论,同样,他还在不少地方谈到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他认为生产费用是价格的基础,是价格的最低限度。他曾说:“如果一个生产事业的产品不多于它的生产费用,那便没有新价值的产生,因此也没有新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8页。

财富的创造。”(第 236 页)他所说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利息和地租构成的。依照萨伊的意见,构成生产费用的这三个因素分别是使用生产三要素所支付的代价,这样,为了说明生产费用又不能不考虑生产三要素的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了。

萨伊有时又把生产三要素叫做“生产手段”或“生产来源”。

当萨伊断言效用是价值的基础时,他是从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的。就是说,他认为商品能够直接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供人享受,有效用因而也有价值。但是有些生产来源例如一块地或一件工具是不能直接供人享受以满足其需要的。那么,它们的价值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这个问题倒是为萨伊所注意到而且予以解释的。他说:“它们(指生产来源——引者)的价值基于它们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指产品价值——引者)本身则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第 361 页)^①

本来,生产费用论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循环论。如果我们可以把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叫做小迷宫的话,那么,萨伊的价值论就可以说是大迷宫了。当他不能依靠效用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供求论;供求论失去作用的时候,他又陷入生产费用论;在要彻底说明生产费用即要说明所谓“生产来源”的价值的時候,他已回到效用论了。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到出路!

虽然如此,萨伊的“服务”也还是有所“贡献”的,那就是他把早已有人发表过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论,收集起来,左右逢源地灵活运用

^①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种由产品价值决定生产资料价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庸俗生产费用论恰好是矛盾的。

用,借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四

萨伊的分配论是以他的生产三要素论为基础的。根据他的理论,生产有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协力,各自发挥其作用而表现生产的性能。这就是人的劳力、“自然的劳力或自然的生产性服务”和“资本的劳力或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第91页)

这三个要素所有者由于它们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由劳动的服务产生工资,资本的服务产生利息,土地的服务产生地租。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予以全面分析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劳动——工资;

资本——利息;

土地——地租。

照萨伊的说法,无论什么时代和无论什么地方,进行生产就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而它们的服务也必然会使其所有者取得相应的收入。这样,他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消除,而使它们变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收入形式了。

亚当·斯密曾经明白地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的扣除部分,因而他“已经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认识了”^①。而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则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页。

三种收入是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剩余价值就完全被抹杀了。这样,萨伊完全拒绝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而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利益调和”论打下了基础。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分配问题上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萨伊这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斯密的科学观点,而利用其庸俗的见解。这首先在工资问题上表现出来。

亚当·斯密一方面认为工资是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的一部分,这样就有可能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他又不加批判地使用“劳动价格”这个术语,认为工资就是劳动价格,从而又掩盖了那种剥削关系。萨伊既然断言工资是劳动服务的报酬,那么劳动者已得到他所应得的全部代价了,因此,他们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剥削。不仅如此,他还硬说,低工资对于全社会都是有利的。他在反对西斯蒙第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建议时曾说:“所谓低的工资率只对雇主有利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工资率的降低和跟着而来的竞争的不断作用,必定使产品价格下降,因此从工资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费阶级,或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第419页)这种论调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这里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它同萨伊自己的效用论也是矛盾的。因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既然是效用,而工资的降低绝不会使商品的效用发生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影响商品的价值。这种“理论”虽然是极其错误的,但由于它是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强辩的一种工具,所以一直到今天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取。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还利用它作为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武器。例如,所谓冻结工资政策和以反对通货膨胀为借口而限制工资的措施,都是以这个“理论”

为武器的。

萨伊不但否认工人被剥削，而且还把工人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等同起来，认为他们都是劳动者。他把人的劳动分为三类：1. 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劳动，其任务在于阐明理论；2. 农场主、工厂主或商人的劳动，其任务在于应用；3. 工人的劳动，他们“在前两种人的指挥监督之下提供执行的力量”（第 83 页）。照萨伊的这种说法，工人和企业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是劳动者，不过前者的任务在于“执行”，而后者则以“应用”为其任务。由于“应用”比“执行”更复杂更困难，因而企业家所得到的工资比较工人的高些罢了。这样，他又把亚当·斯密的利润论庸俗化了。

亚当·斯密曾经指明：利润是归资本家所占有的、从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利息是从利润派生的。萨伊把利润划分为“资本的利润跟使用资本的劳动的利润”（第 438 页）两部分。前者是“对于资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第 431 页），即资本生产性服务的报酬，这其实就是利息。后者则是企业家即萨伊所说的冒险家经营管理等劳动的报酬，这就是企业家的收入。尽管他在本书中说了一大堆利润，例如什么“一般劳动利润”、“资本利润”和“地产利润”等等，实际上，他已把这个经济范畴取消了。因此，依照他的观点来说，“三位一体”公式中所包括的一个公式，不是资本——利润，而是资本——利息。

萨伊一方面漫无边际地使用“利润”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又于实质上取消了它。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都在追求同一个目的，即便于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并且为“利益调和论”奠定基础。

萨伊扩大“利润”这个概念是同他扩大“资本”这个范畴有着密